

溯源 / 甘肃

寻迹陇东南

本报特约撰稿人 朱姝民



礼县四角坪遗址出土的云纹瓦当

陇东南是指位于陇山两侧的甘肃省东南部地区，陇山以东地区受季风与泾河水系的滋润而形成肥沃宜耕的土壤，以西虽有渭河水系但因降雨稀少等原因形成了广阔的宜牧草原，使陇山地区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之地，孕育出多民族在此交错杂居，进而铸就了陇山丰富的人文与历史。

以文学意象言，以陇山为载体，形成了灵动、开放，层次丰富的陇山文学体系。以历史地位言，陇山地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陇山两侧的泾、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近现代以来，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也证实了这条山脉两侧的广大土地是中华文明起源之地之一，在农业起源、城市起源与早期古国等多方面，为探究和揭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线索、新资料；这里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是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的重要交流区，在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期人类的栖息家园

陇东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即有丰富的文化遗存。1920年，庆阳辛家沟和赵家岔发现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开启了甘肃乃至整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此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陇东南地区皆有相应时段的遗址发现，如巨家塬、楼房子、刘家岔、寺沟口、合子沟、南峪沟等。平凉泾川大岭上发现了甘肃现存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庆阳镇原县姜家湾和寺沟口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平凉泾川牛角沟遗址

发现的“泾川人”头盖骨化石，打破了甘肃旧石器时代考古“只见器物不见人”的困局；20世纪80年代，武山县鸳鸯镇西南大林山下先后两次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即著名的“武山人”，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近年天水张家川杨上遗址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目前陇西黄土高原有明确科学测年数据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考古发现表明，陇东南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已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

传说时代隐藏着人类的发展轨迹，尽管目前还不能够被完全释读，但无疑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作出了启示。中华文明萌芽时期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传说中追溯本源的中华历史扉页。伏羲氏一画开天，引领先民告别蒙昧洪荒，是开启中华文明序幕的人文始祖和文化英雄。黄帝轩辕氏居五帝之首，是炎黄时代的开创者和华夏民族人文初祖，其所代表的发明创造、文化成就和社会生态，标志着中华先民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伏羲、女娲成婚繁衍人类，黄帝生于上邽轩辕谷，黄帝往崆峒问道于广成子……这些与三皇五帝有关的传说，富集而久远地流传在陇东南，表明这一地区在人类探问文明源起之始时即参与其中，是中华文明萌芽的理想之地。

传说时代所对应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无疑是最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甘肃素称“彩陶之乡”，谱写了中国彩陶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而它的源头正是天水秦安大地湾。自大地湾伊始，彩陶文化

以那个时代独有的璀璨创造力，记录了史前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天水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平凉侯家台、庆阳宁县董庄及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的陇南西和、礼县、徽县、武都等地发现的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丰富了甘肃境内前仰韶文化的内涵。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揭示了甘肃地区悠久、深厚的文化面貌和成就，向世人展示了先民们在此捕鱼狩猎、起建居室、制陶作器、种植耕作、饲养家畜、发展聚落的生活印记，打开了后人探看先民已经颇具规模的多层级复杂社会的新视角。大地湾之后，陇山西麓天水张家川挖塔川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和陇山以东庆阳南佐具有郡邑性质的仰韶文化晚期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的发现，以及平凉灵台桥村龙山时代具有区域中心性质大型聚落的持续发掘，刷新了我们对陇山两侧史前社会文化创造力与文化发展高度的认知，也证实了这一地区在农业起源、复杂社会发展程度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周人兴起与礼乐萌芽之地

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亦世戴德，不忝前人。”（《国语》卷一《周语上》）说明周人发达的礼乐文明和农耕文化传统，亦是奠基于陇东地区。从《诗经》中也能看到周人部族在陇东的艰辛奋斗过程，如最具代表性的《七月》反映了周人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耕牧社会；《公刘》则反映了周族武装迁徙、军队垦田，在邠地建国的壮举。在经过几代首领的励精图治后，到了公刘之时，周人部族在陇东的势力获得了迅猛发展。公刘时代，周人将先祖流传的农耕技术进行推广，同时对陶器烧制、青铜制造、房屋建造、家畜驯养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陇东地区社会也完成了由原始农业向农耕文明的转型，迎来了历史发展上的昌盛期。而周人创造的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基础的周文化，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如礼仪和道德传统，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

映照在考古学文化上，甘肃陇东南地区分布着丰富的周文化资源，在平凉、庆阳、天水等地清理和发掘了200多处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遗址。宁县石家及遇村遗址的发掘，建立了陇东地区西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西周建立前，泾河流域内分布有周文化聚落，如平凉境内集中分布在灵台、崇信、泾川、崆峒区的周文化遗存，以灵台古密须（密国）、白草坡西周墓、崇信于家湾周墓和泾川遗址为代表，尤其是崇信于家湾先周遗址，从1980年至1986年先后历经六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先周到西周末的138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表明周人在此有着很好的经营基础，为研究周文化在甘肃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渭河上游及其支流沿岸散布的西周中期遗址点，说明周灭商后在陇山以西也有所作为。

早期秦文化孕育的沃土

西周时期，周人入关中，陇东南地区成为西周边陲。被周人征服的秦人先祖西迁至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史书记载，秦人来自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少昊部落，自商代开始从山东一带西迁，秦先祖中湣曾“在西戎，保西垂”，为商保疆。西周时期迁徙至西北，作为外来者初来乍到，几乎无任何根基，且戎族在侧虎视眈眈，生存状况相当险恶。这种凶险在《诗经》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与其他国风不同，《秦风》中绝大多数篇幅是在描述战争，尤其是与西戎的战争，如《车邻》《小戎》等。秦人代代不息奋斗，其命运终于在周孝王时期迎来转机，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召使主马汧渭之间……封其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之后秦人世代在周王室和西戎部族之间蛰居斡旋，并最终完成由附庸、大夫到诸侯再到秦帝国的华丽转身。陇南、天水一带西山、大堡子山、李崖、毛家坪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早期秦人在甘肃东部的活动，使我们对秦文化的渊源和特征有了实质性的直观认识。西山、大堡子山遗址、鸾亭山遗址为探索早期都邑西犬丘、西新邑、西畴等史书所记载的秦人重要活动场所提供了重要线索。清水李崖遗址为秦人东来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甘谷毛家坪遗址极有可能是春秋早期秦武公所设的“冀县”所在。出土的铸有“秦公作子车用”的铜戈，以实物为子

车氏家族作了印证。礼县四角坪发现了秦帝国时期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遗址。纵观秦人在陇东南地区的历史，从中湣至非子，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秦人努力协调其与西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终于在陇东地区安居下来。同时，秦人充分利用当地农牧兼宜的条件，发挥自身农牧兼长的优势，慢慢在这一地区扎下根基。从非子至秦文公的十几代秦人在陇东地区扎根、发展、建立国家，并立足自身传统，积极接受中原文化，又广泛吸收西戎、北狄和域外文化，形成了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早期文化。其所具有的豁达、进取、剽悍的风格与尚武、重利、坚韧、质朴的民族性格，这些都成了秦人发展和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文化基因，并对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垂瓣纹秦公铜鼎



崇信于家湾先周遗址出土的铜爵

秦戎文化交流的舞台

形成因素里有来自寺洼文化的因素，而秦人与西戎的关系与周人较之似更甚，在早期秦文化的构成中，屈肢葬、金器、铁器、动物纹样、铜镜和短剑的使用、墓葬的壁龛与围墓沟，都可能来自西戎。依据目前的考古学资料，甘肃境内有关西戎文化的发现，主要分布在陇东南地区。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秦人遗存和西戎遗存，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毛家坪B组遗存”揭开了史书中记载的西戎族群的考古学文化面貌。2006年，张家川马家塬发现了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的西戎贵族和首领的墓地。墓地以独特的墓葬形制、装饰华丽的车辆、复杂的人体装饰以及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而闻名，带阶梯的甲字形大墓的发现，使处于秦人羁縻下的西戎贵族和首领的生活、文化面貌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独特的葬俗、豪华的随葬品以及奢华的战车使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所带来的

璀璨成果在西戎部族身上得到了见证。天水地区与此文化相近者还有秦安王洼墓地、清水刘坪墓地，庆阳、平凉等地也都有西戎遗存发现。这些遗存反映出西戎在这一时期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并且在经济、社会形态、手工业、文化、城市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发展。这足以看出，西戎部族并非传统史籍中所载的“化外蛮夷”，他们和华夏族一样，都在先秦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回望奔流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陇山两侧的广大区域不但孕育了距今百万年的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曙光，还孕育了代表古典文化最高成就的周王朝，结束列国争霸、一统中华的秦王朝以及因为战争征服而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西戎部族，他们共同参与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文明发展史，又在不同时期创造了以时代特色为印记的文化成就，昭示了陇东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进程中的地位。



陇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